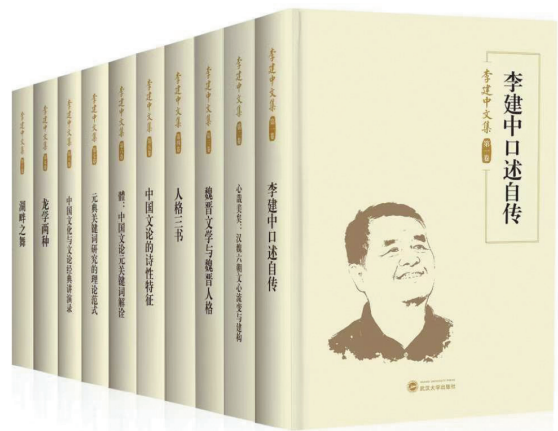


主创谈

编者按

8月16日,《李建中文集》首发式在贵阳孔学堂举行。《李建中文集》共10卷,包括《李建中口述自传》《心哉美矣:汉魏六朝文心流变与建构》《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人格三书》《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體: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论》《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龙学两种》《湖畔之舞》,共400余万字,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与孔学堂书局联合出版。



《李建中口述自传》

文集十卷,400余万字,记录的既是我的治学经历,也是我的学术三缘:地缘、学缘、情缘。

先说地缘。

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也应该有地缘学术。执教50多年,待的时间最长也是缘分最深的是两个地方:南湖东岸的中南民大和东湖北岸的武汉大学。中南民大的校园远离市区,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入校须穿过一大片农田,这种原生态的野性有一种诗性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没有现在这么“卷”,特别是这个田野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本真、质朴和生命力。在诗性南湖,我发现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既

学术三缘

李建中

表现为批评文体的言说方式、话语风格和范畴构成,也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文集首卷《口述自传》辟专章讲述诗性田园,第二卷《心哉美矣》阐释中国文论的诗性范畴,第三卷揭示魏晋文学的诗性建构与魏晋人格的诗性呈现,第五卷则专论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

武汉大学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大学”,我在武大工作20多年,最深的感受还不是校园之美,而是格局之大:东湖水库拥着珞珈山,这种校园格局在西周时代叫“辟雍”,是“大学”的别称。与南湖田野相比,珞珈辟雍的最大特色不是诗性而是兼性。手持双禾为兼,兼性是指对二者或者多者能够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兼性智慧是一种兼济天下、兼怀万物、弥纶天地之道、通天下之不通的大智慧。我在辟雍之地兼美科研与教学,兼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兼美文论关键词的“说什么”与“怎么说”。如果说文集的六、七两卷是在纯学术层面探讨中国文化及文论元关键词兼性与诗性的高度融合,那么八、九两卷则是以讲课实录的方式阐释文论典籍的兼性智慧与诗性魅力。

次说学缘。

20世纪80年代在桂子山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学位,我的母校华中师大实行的是“导师组”制度,我有三位导师:曾祖荫、王先需和周伟民。同样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桂子三师的路径并不一样:曾老师是美学范畴,王老师是心理分析,周老师是中西比较,三位导师为我这个初学者指引了入门路径,提供了方法论启迪,其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深爱成为我终身的精神财富。第四卷《人格三书》有着鲜明的桂子山特色:对中西文化人格的心理学分析和审美学批判。

杨先生是龙学泰斗,蜀学大师,“一辈子一本书”的自强弘毅成为我“一辈子几个关键词”的学术支撑,“学不已”的治学精神鞭策我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受惠于杨先生的龙学成就,30多年深耕《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和兼性阐释,第九卷《龙学两种》提出三大命题:创生青春版文心雕龙、标举20世纪龙学的四大名著和开创21世纪龙学传播的通讯模式。

钱先生著作等身,逾千万言的《清诗纪事》乃旷世巨编,贯穿80余年的《梦苕庵诗文集》更是学人之诗的巛

峰、各体兼擅的楷模。钱先生20世纪60年代受郭绍虞先生之邀参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0世纪70年代主持该书的修改扩编并审阅通读全稿。钱先生的创作是诗性的,钱先生的学问是兼性的,受钱先生的启迪,我的文集十卷,从《口述自传》到《湖畔之舞》,400万字贯穿始末的是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诗性之兼(诗性话语建构兼性范式)与兼性之诗(兼性路径创生诗性境界)。

最后说情缘。

前面说的地缘和学缘其实都包含着情缘:对南湖半岛和辟雍之地的眷恋之情,对5位导师还有对学界同仁的感恩之情。情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这里着重讲师生之情,尤其以贵州班为例。贵州班是武大文艺学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班,在贵州省文化、教育、宣传、出版系统定向招生,连续招了5届,培养研究生近百人,毕业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勤勉精进,成就斐然。贵州班同学因为对学术和文化的虔敬而尊敬老师,与文艺学的老师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情谊。文集首发式为何在贵阳举办?缘于师生之情。同样是缘于师生情,各位同学为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作。

“情”之成缘,是有来历和渊源的:我与门下弟子的师生情,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与恩师的师生情。桂子三师将我这个学术小白引入学术之路,蜀学杨师和吴学钱师又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的学术品位。杨先生对弟子非常严格,但学生一旦遇到难处,先生又千方百计排忧解难、补苴罅漏。钱先生对弟子更是呵护有加:论文答辩那天,钱老生病住院,怕有闪失,特地从医院赶到学校,穿着病号服旁听答辩会。

师生情,是老师对学生“视若己出”;学术情,学术就是学者的“己出”。文集十卷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情缘结晶。刘勰著《文心》,慨然于知音,梗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情酿酒,情愈深而理愈真,情愈浓而理愈重。理论并非灰色,因为缘于情。

学术三缘,地缘和学缘,其深处皆是情缘,是师生之情、同门之情、同道之情,是对师友的感恩之情,对弟子的抵牾之情,对学术的虔敬之情。

(作者系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



《廖崩塔佩合唱团》

《廖崩塔佩合唱团》是一本令人惊喜的童书。它来源于生活,做了大量的调查,做到了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统一。来自生活的语言和扎根生活的想象是最有生命力的。书中大量用拟人等修辞手法,儿童视角下的万物有灵随处可见地穿插在故事里。故事呈现的矛盾冲突和成长弧线蜿蜒流淌,仿佛山歌一样九曲十八弯,动人心弦又松弛自然,清丽脱俗又蓬勃有力。

拿到这本书,只见它封面上写着“夏天到了,这个夏天和以往不同,它蓬勃勇敢,它有廖崩塔佩。”这么有感染力的语言,让人忍不住翻看。《廖崩塔佩合唱团》语言、故事、句子结构等的陌生化处理,确实做到了与众不同。全书从简单到深刻,做到了深入浅出。独具特色的语言节奏,赋予整本书音乐性。文字感性,情感充沛,富有感染力,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全书长短句交替使用,大胆使用短句成段,加上歌词的引用,形式多变又内容丰富。像“梢公多了打烂船,主意多了日子难。”“甘蔗长长,一节管一节。”这样的大量的短句短促有力,形成了掷地有声的效果,也增加了阅读体验。

这本书鲜明的地方特色将它与其他童书区别开来。书中详细描写的玻璃花腊肉、刺巴笼、鹅烟草、点灯猫(蜻蜓)、芦笙、月琴、木叶、五彩糯米饭,恐怕是很多小朋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美达寨的女孩,从小除了有自己的小围腰和小银铃,还有自己的小板凳和小猪草刀。村里小节日天天有,米酒喝不完。酒是感谢土地的馈赠,过节是为了庆祝丰收。还有苗族做衣服的过程等各种民俗,都是区别于城市生活和现代体验的。

肖勤擅长细节描写,并将细节具象化、画面化,赋予读者很强的在场感,也给了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作者致力于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讲抽象的事物,做到了适度的浅语化。比如书上说“世上的事万万千,不求同样一般。”后面接着跟上一句“这就像你没法跟黄连说甜,也没法跟蜜蜂说酸。”细节的立体鲜明让情感在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语言中激荡,沿着故事的曲线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比如作者写孩子下坡,接着解释了就是在山坡上找一个没有树丫和刺巴笼遮挡的地方,直接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坡下去。狗会提前下去,用身子挡住楼下来的孩子,避免掉下去。作者写奶奶从医院回去,说屋子里沉睡的空气、锅子、板凳都活过来,既形象又亲切,符合儿童读者心理期待。

这本书注重五感的描写。其中有表示声音的描写和词语大量应用:噼里啪啦、叮叮当当、狗叫声,老师笃笃笃写着算式;孩子们听说讲座取消发出的叹息声“唉”;吴当久生气地搁话筒用了“咚”的一声;装表的硬黄口袋喀嚓作响;小吉老师出现时,细糯的声音像羽毛一样清颤;细糯唱《谷雨天》,声音像一个个小雨点落在芭蕉叶上,又像一串串银饰在月光下小心翼翼地碰响;小吉老师的声音像刚起锅的米汤,糯糯的、香香的、滑滑的;严玉医生的声音温柔,像一团糯糯的热糍粑。这些密集的生活质感的声音描写让人物的刻画立体可感,也与整本书主题更加契合,让整本书特色更加鲜明。

通过生动的描写和人物弧光的刻画,作者笔下的小主人公成长线清晰,个性鲜明,富有童趣。她们是一群大山里的孩子,她们是一群想读书的孩子,她们是有着自己梦想的孩子。后来支教的小吉老师给她们起名廖崩塔佩合唱团。14岁的滚红糯,在谷品小学上六年级。作者是这样写她的:声音像藏在溶洞里说话一样,作妖作怪,还要做主,她的理想是当个医生治好奶奶眼睛上的白膜。而她每天上学之余要写作业煮猪食、喂猪、放牛。她接下来的学习生涯也将面临巨大挑战,上初中要坐摩托车或坐船去上学,而且花钱不少。作者写滚红糯,没有着重于其行为的不同,而是着重思维方式。作者在写算数学题学《程门立雪》那里,呈现出了山里孩子和城里孩子思维的巨大差异。红糯认为,有程门立雪的时间,她猪草都打了两背篓了,还可以采一筐辣椒。思维方式更加具象化。而算小狗小鸡有多少只时,红糯用了“咥当一下”,小狗坐下,咥当一下就没了26只脚。是全凭生活经验来的,而不是靠单纯的数学思维。而细糯认为,母鸡和鸽子是一个妈生的,胖的成了母鸡,瘦的就成了鸽子。这些都是由于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不同而造就的,这种描写和塑造人物的方式,既有趣味性又容易在读者心中留下记忆点,对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要求极高。

书中不时流露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大地妈妈生养万物,人可以吃的东西,也应该留一点给虫子吃。收割谷子的时候,人们也会留几簇给小鸟吃。”老歌师认为孩子们出了山只是一片离开大树的叶子。奶奶每天干不完的活:挖土、除草、种菜、织布、染布、绣衣袋。书中小吉老师和周握手都意识到了乡村振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发展。

村里人条件艰苦,村民靠吃炸蚂蚱解吃炸鱼的馋。爸爸滚糯谷是苗寨的芦笙王,要去城里背水泥,妈妈杨花要在城里背背篋。就是这么美的地方,大人们都下山到城里去了,当保安、当背篋、推板车、和灰浆、背砖……小吉负责想办法激发孩子们的自信心和勇气,引导大家继续念书;周握手负责跑项目修路,争取让车子开到美达寨,减轻孩子们上学的负担。录MV过程中,大鹅也跟着嘎嘎叫,村里人一致决定,这批大鹅见过世面了,不能拉去卖,都养着,养到老。开秧门的时候,音乐老师来听唱歌,看到孩子们以梯田做舞台合唱《谷雨天》,细糯领唱,说出“原生态的才是最美的”。女孩们像小野羊一样在山地蹦蹦跳跳不停,丝毫不觉得累。

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电影一样的画面感。故事的最后,超哥来了答应给唱歌,连拍摄也包了,歌名就叫《大山的小孩》。女孩们也参加了她们想都不敢想的在台盘村“村BA”现场表演。

廖崩塔佩,勇敢女孩。这个故事立足当下,它传承着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希望,希望小朋友都能读一下这本书,走进美达寨,在心中埋下一颗勇敢的奋勇直前的种子,冲破一个个困难,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从贵州看数字时代区域形象传播——读《新时代大数据发展与贵州新形象传播》有感

黄升民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浪潮席卷而来。大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与技术底座,早已超越技术工具范畴,正重构着传播领域的生态格局。当数据的流动突破地理边界、消弭了传播壁垒,区域发展的赛道也被重新定义,区域形象传播则迎来了从传统叙事到智能建构的全新变革,开启了智能传播的全新阶段。

我国大数据产业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到技术体系融合优化,从基础设施搭建到全产业深度应用,完成了从单点突破到生态构建的历程。数据的深入挖掘、融合流动、智能分析,则为信息生产、传输、呈现赋予了新的内涵,也让区域形象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介宣传、文化展示,而是融入产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传承的全维度实践之中。传播从来不是孤立的行为,其始终与时代发展、区域实践同频共振,而大数据正是搭建起二者深度融合的桥梁。

贵州,这个曾因地理区位、产业基础薄弱而被贴上“闭塞”“落后”标签的西南省份,在大数据产业的浪潮中实现了历史性破局。昔日的刻板印象,曾让贵州陷入形象认知的困境。而新时代的贵州,敏锐把握大数据发展的历史机遇,将其上升为全省重要发展战略,从“云上贵州”到数博会品牌打造,从数据中心集聚到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培育,大数据不仅成为贵州经济后发追赶的新引擎,更打破了地理空间的传播阻隔,让贵州从“被定义”走向“主动塑形”,完成了从欠发达地区到全国大数据发展标

杆的形象重构,成为西南区域借数字技术实现形象升级的典型。

顾雪松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敏锐地把握住了近年来贵州出现的新变化,以贵州的实践为核心样本,通过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撰写《新时代大数据发展与贵州新形象传播》精准回应了数字时代区域形象传播的核心问题。本书抓住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大数据,二是新形象。前者代表新时代最宝贵的技术变量,后者则指向区域发展的认知结果和传播目标。把二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社会运行和传播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当下,一个区域如何借助大数据来发展,进而实现形象逻辑的更新。这个问题,既属于贵州,也不只属于贵州;既是一个地方命题,也是一项时代命题。本书并没有把区域形象简单理解为一种宣传结果,而是把它看作发展实践、媒介叙事与受众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理解是准确的。研究团队以实证研究为核心方法,从经济、科技、文化三大维度,细致解读大数据如何赋能贵州农业、旅游、工业的形象重构;如何推动中国天眼(FAST)、贵州“村超”等典型案例的传播出圈;如何让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实现创新表达,让技术赋能形象传播的实践路径更为具象。

贵州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中国西部地区在新技术浪

潮中寻找发展突破口的一个缩影。后发地区并不只能沿着既有路径追赶,也可以借助技术革命重塑竞争优势;区域形象也不必长期受制于外部定义,而可以通过发展实践与传播创新实现主动建构。

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区域形象传播研究也将和技术赋能下持续迭代。《新时代大数据发展与贵州新形象传播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技术与传播、发展与形象的内在关联提供了重要视角。这样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原院长、教授)



《新时代大数据发展与贵州新形象传播》

乡村妇女的最美模样

——《姑妈篮球与“她文化”“她力量”》读后

韦通贤

一颗小小的篮球,活跃在苗乡侗寨的田间赛场,奔跑于乡土大地的烟火人间,为万千基层农村妇女的生活点亮了色彩。余天英所著的《姑妈篮球与“她文化”“她力量”》一书,以细腻真挚的笔触和扎根乡土的视角,记录了贵州雷山姑妈篮球从民间自娱自乐的乡村活动,成长为破圈出圈的特色乡土IP的过程。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理论,而是凭借真实的人物、鲜活的场景以及滚烫的故事,解码乡土女性的精神蜕变,生动描摹出新时代基层农村妇女自信、从容、幸福、热烈的最美模样。

何为姑妈篮球?书中给出了质朴、温暖的答案:它不同于专业篮球所采用的严苛规则体系,诞生于黔东南州雷山县苗族村寨,根植于“姑妈回娘家”这一千年民俗,是专属于乡村女性的民间体育盛会。这项赛事摒弃了烦琐的竞技规则,不设严苛的走步限制,也不苛责细微失误,秉持“快乐至上、包容开放”的初心,只要心怀热爱、尽情参与,就可以成为赛场的主角。这里的姑妈,是外嫁返乡的女性,是乡村的普通妇女,是在灶台、天地间操劳,默默隐匿光芒的乡村女性群体。在传统乡土语境中,农村妇女往往被局限在家庭琐事和农耕劳作的单一角色里,缺少自我表达的舞台,留给个人舒展身心的自主选择空间相对有限。姑妈篮球的出现,打破了她们日常生活的边界,让灶台边的主妇和田埂上的劳作者,得以成为赛场上奔跑拼搏、肆意欢笑的女运动员,使得普通乡村女性的生命力尽情绽放。



《姑妈篮球与“她文化”“她力量”》

这本书最动人的价值,在于借助一场场乡村篮球赛,读懂了独属于乡土的她文化。姑妈篮球的文化内核,也就是乡村女性解锁新角色、彼此守望、向阳而生的一种温柔力量。书中细致记录了赛场内外的温暖细节:赛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姑妈们并肩奔跑、默契配合,不惧输赢、全力拼搏;赛场下,邻里乡亲敲锣打鼓、呐喊助威,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只有欢聚与热爱。这场源于民间、兴于民间的体育盛会,打破了传统乡村的一些老观念。它让大众看到,乡村女性向来不只有温柔隐忍、默默奉献这样的一面,还拥有热血勇敢、蓬勃向上的面貌。这种扎根于乡土、源于群众的文化,不刻意、不张扬,根植于民俗文脉之中,生长于烟火日常之间,既是新时代乡村文明当中最为鲜活的载体,也是基层女性自我认同以及群体共生的精神底色。

乡村女性的力量常常被忽视,而姑妈篮球则让藏在乡土里的巾帼力量得以被看见、被尊重、被传播。余天英在书中借助大量真实案例,展示女性突破自我的成长力量和女性团结互助、携手同行的凝聚力量,还有一种乡村女性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在一次次赛事的历练中,基层妇女眼神变得愈发坚定,身姿变得愈发挺拔,活出了自信昂扬的新时代乡村女性模样。

这本书还把姑妈篮球所催生的地域经济展现了出来,展示了乡土巾帼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从田间地头的自娱自乐活动,发展到全网热议的乡村IP,姑妈篮球依靠独特的民俗特色、纯粹的烟火气息以及鲜活的女性力量,